

十五年間

王建民

山東人民出版社

十五年 间

(文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五年间 / 王建民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 - 7 - 209 - 08948 - 7

I. ①十… II. ①王… III. ①社会主义理论 - 理论
研究 - 文集 IV. ①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938 号

十五年间

王建民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914

市场部(0531)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济南大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32 开(151mm×228mm)

印 张 30.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8948 - 7

定 价 6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调换。

目 录

唯心史观与群众史观 / 1

战争观中的科学与伦理 / 11

实践·直观·真理标准 / 29

批评当求准确公正——与俞吾金先生讨论 / 47

论活劳动商品——兼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若干
矛盾 / 74

私营企业主不是劳动者? / 111

论劳动力商品的自我增殖——兼评“人力资本”理论 / 118

论超阶级民主 / 143

“议行合一”政体论解析 / 149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打碎旧的
国家机器”思想研究 / 164

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 / 247

新民主主义再认识 / 285

雇佣劳动者发展史的新阶段 / 300

2 十五年间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社会主义观述评 / 335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观的变革 / 394

秋瑾就义前后事 / 456

根据地的宪政建设 / 460

张志新殉难 24 年祭 / 469

温斯医生的求助 / 474

一个普通人能做到什么 / 477

后 记 / 481

唯心史观与群众史观

哲学家们说，历史唯心主义者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从社会的精神生活，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意志中寻找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因，必然会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世界的历史，否认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不正确。

—

先看历史。

思想史表明，并非所有的历史唯心主义者都是英雄史观的拥护者；他们当中部分人与其他历史唯心主义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19 世纪的俄国民粹派中就有坚决反对英雄史观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民粹派思想家代表人物之一彼·阿·克鲁泡特金在《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一文中，对下述观点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社会总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取得进步的，即某些偶然遇到了特别有利条件的少数人，比其他所有人更开化，

发现并向世界宣告了新的、只有某些有学识的人才能领会的真理”^①。

谈到社会革命的策略时，克鲁泡特金说：“首先我们深信，如果人民没有革命的需要，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少数几个人，不管他们多么有力量和有才能，如果人民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除了起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他们不满意的境地的时候，那就不可能发动人民的起义”^②。

在《互助论》一书中，克鲁泡特金批评道：“当代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仍然是倾向于认为群众和人类社会制度的进化很少关系，而把这方面的一切进步都归功于愚钝的群众的知识领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过去的编年史家把折磨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小战争和小灾难都详尽无遗地加以记述，但他们却毫不注意群众的生活……所以，有最善良意愿的历史学家也不知不觉地把他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歪曲了”；历史学家要正确地描述某一时代，就应该“研究群众的生活，研究他们用什么方法即使在屈服于国内最暴虐的神权政治或专制政治的时候，也能保持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平等、互助和互援的观念——一句话，以习惯法——为基础的自己的社会组织，研究人类发展的这个方面，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人类生活的真正科学的重大问题和职责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群众在他们的互助制

①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

②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度中所表现的建设天才”^①。

按照哲学家们的意见，此言只能出自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口。然而，这却是一位历史唯心主义者的话。克鲁泡特金认为，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是所谓永恒的“人类的天性”，即他所说的“互助”；人类历史上的种种社会制度都起源于这个“天性”；人类历史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归根到底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②。克鲁泡特金同那些信奉英雄史观的民粹派分子一样，亦是一位历史唯心主义者。

一份 19 世纪 80 年代的俄国民粹派纲领性文献《民粹派基本提纲》，既表明了民粹派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于把人分为英雄与群氓的反对立场。《提纲》宣称民粹派学说的出发点是人类平等，即承认全人类无条件地具有直接掌握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最高逻辑真理和道德真理的能力。民粹派所主张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最高道德真理的简单原则也同样能够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些原则出发，民粹派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哪个人有掌握这些真理的特权，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权利认为群众似乎应当通过这些特权人物学会掌握这些真理的能力，因为这些真理似乎不是群众思想中所固有的，而是有智慧和文化的人脑力劳动的结果^③。

① [俄]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5、111、113、150 页。

② [俄]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沅译，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7、143、199—200、202 页。

③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53、555—557 页。

把所谓的逻辑真理和道德真理宣布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这是十足的历史唯心论。《纲领》同时又宣称这些真理思想是劳动群众所固有的，是潜在于他们之中的，掌握这些真理并不是哪些个人的特权。

事实上，在19世纪60、70年代，许多唯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坚决拒绝英雄史观，而群众史观几乎被当成信条；它是有名的“到民间去”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

有这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在谈到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有时说出自相矛盾的意见，例如黑格尔。黑格尔常以“有教养的人”口吻谈论人民群众。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人民“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①《历史哲学》一书在谈到古希腊历史时说：“……人民是助唱队——他们消极、被动；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担负责任。他们双方之间绝对没有共同的地方。”^②

但同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就英雄和群众的关系谈到过完全相反的观点。众所周知，在世界近代史上，拿破仑几乎就是英雄的代名词，没有人比他对历史进程造成过那么巨大的个人影响。按照哲学家们的说辞，黑格尔应该把拿破仑说成是

①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9、323页。

②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76页。

“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梁启超语）式的人物。然而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在叙述过拿破仑的内政外交文治武功之后，黑格尔说：拿破仑利用他性格上无限伟大的力量“征服了整个欧洲，使他的开明的政制散播到了四处八方。古往今来，没有人赢过更大的胜利，没有人在征战中表现过更大的天才；可是‘军事胜利’的无能为力，也没有显得比这时更为清楚的了。法兰西人民的意见，就是说，他们的宗教的意见和民族的意见，终于使这一位巨人崩溃了”^①。我们看到，不是拿破仑的“意见”支配着法兰西人民，相反，倒是法兰西人民的“意见”支配着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有不少思想家提出过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思想，如“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等贵民、重民思想。在这方面，西汉初年哲学家贾谊的思想特别鲜明。贾谊生活的年代去亡秦不远，新王朝还不十分巩固。贾谊认为，国家安危，社会治乱，根本上在于人民的状况。他在《大政上》篇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又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②。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了秦灭亡的教训。他指出，才能不及中人的瓮牖绳枢之子陈涉，率罢散之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使“六合为家、骹、函为宫”的秦王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497—498 页。

② 《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3—65 页。

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其原因在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使得“百姓怨望”。在这里，贾谊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贾谊是汉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仍然是个唯心主义者。在《保傅》一文中，贾谊把国家的长治久安寄托于太子自孩提时所受的教育，认为在太子刚懂事时，就应“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①。贾谊在这里告诉统治者，国家要长治久安，统治者必须清正廉洁，欲达此境界，人君应以身作则，欲使人君能率先垂范，需从太子的教育开始，而太子正则天下定矣。在文章中，贾谊三番五次把这一点作为商、周两朝长期领有天下的原因加以强调。贾宜此番议论的唯心史观色彩非常鲜明；他把社会大治的理想建立于道德教育的基础之上。可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贾谊，也不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者。

有必要补充一点。贾谊的上述议论有着国家治乱系于国君一人的意思，这似乎同他重视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同我们在黑格尔那里遇到的矛盾不同；黑格尔的两种观点在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而贾谊的两种观点只是在表面上相矛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君王对国家治乱的影响及其结果

^① 《贾谊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1页。

并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事，而是以是否顺乎民意为基础，归根到底，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治乱。顺便说，这种重君和重民一致的思想是不少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共有的。

思想史上的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对立，不仅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之间，它也存在历史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甚至存在于同一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之中。那种认为历史唯心主义者都是英雄史观的拥护者的结论不符合思想史的实际。

二

不必说，仅仅列举事实是不够的，这些事实需要被理解，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乍看上去，同一唯心主义阵营里发生了两种观点的对立，其中必有一种观点与唯心主义基本观点相矛盾；思想家说出同自己的世界观不一致的个别观点，这种事是常有的。但这里的情形恰好不是这样。不论英雄史观还是群众史观都可以在理论上同唯心史观的基本观点并行不悖。

所谓历史唯心主义，就是认为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这是唯心史观的基本观点。这个基本观点并没有限定那个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意识”必定是“英雄的意识”；它可以是“英雄的意识”，它也可以是“人民的意识”。当一个思想家把人民群众的意识看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群众史观与唯心史观便在他身上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上，历史唯物论者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但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在这

一问题上的根本差别不在于赞成还是反对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而在于如何理解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那些赞成群众史观的历史唯心论者把人民群众的意识看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他们因此同与他们对立的英雄史观的信徒们同属唯心主义战壕的同志。历史唯物主义不限于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而且试图唯物主义地揭示人民群众的意识起源，说明他们的历史活动的物质条件。

把群众史观视为历史唯物论者的专利，这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不正确。造成这种不正确观点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没有真正了解群众史观的性质，认为它是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密不可分的，所谓没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也就没有群众史观；没有群众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就没有归宿等等。还有一种更为糊涂的意见，认为“群众史观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①。

单就群众史观的发现和提出而言，完全不必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前面列举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一点。群众史观之可以不依赖唯物史观而被提出，原因在于它并不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只是对历史现象的浅层次概括；它的被发现完全是清晰的历史事实对思想家们的影响。贾谊在西汉初年能如此鲜明地提出群众史观，只是因为刚刚经过惊天动地的秦末农民战争，一个强大王朝的倒塌开端于一个才能不及中人的布衣之子的发难，人民群众的力量得以充分显示。唯心主义大家黑格尔正是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

^① 郭瑞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肯定了法兰西人民的历史作用，绝非偶然。法国大革命中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推动着革命波浪式前进，英雄人物升腾与毁灭的悲喜剧走马灯般的一幕接着一幕，使每一个认真观察过这一进程的人不能不意识到群众力量的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一书中，米涅写道：“当革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一个英雄人物在革命时期是无足轻重的；不是让运动带动着前进，就是被运动抛弃；他们必须走在前头，否则就完蛋。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清楚地看出英雄人物是受着形势的支配；在一切革命中都会涌现许多领袖人物，而当革命需要服从的时候，它只承认独一无二的领袖。”政治党派及其领袖人物的命运完全受群众力量的支配，因此，“各派都想抓住人民群众，向人民表示殷勤，把人民群众看成当时的君主”^①。

米涅的群众史观如此鲜明，以至于走向极端，竟认为英雄在革命时期是无足轻重的。米涅作出上述议论是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发现被提出一代人之前的事；他的观点仅仅来自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而不是任何理论分析的结果，更不是什么来自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推导——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不可能推导出任何可能增进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结论；唯物史观不是可以推出现成结论的公式，它只能为研究历史和观察生活提供指南。把唯物史观当成可以推出现成结论的公式，是对这一科学思想最严重的误解之一。

我们说群众史观仅仅来自历史研究，而不是来自对唯物史

^① [法] 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51、88页。

观基本原理的推论，这决不意味着唯物史观对群众史观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恰恰相反，其意义至关重要。前面谈到过，历史唯物论不只是一般地承认群众史观，而要求进一步揭示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物质条件。这就要求人们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去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前面的例子表明，历史唯心论者主要说来只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意义，此其一。第二，思想史文献除了表明历史唯心主义也曾赞成群众史观外，同时还表明：当群众史观还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时，它就不可能把英雄史观从历史学中最终驱逐出去而使自己站稳脚跟。克鲁泡特金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断定，人民群众的观念决定着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历史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的原因是人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例如，他认为，近代专制主义取代中世纪的制度，主要原因是人民变得信仰专制主义了。可是，什么原因使得人民改变了信仰呢？他回答说：人民轻信了罗马法学家和高级传教士的欺骗宣传^①。这就是说，人民信仰的改变还算不上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终极原因是罗马法学家和高级传教士的欺骗宣传——这是某种改头换面的英雄史观。要想避免倒退到英雄史观，群众史观只能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动摇的科学观点。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① [俄]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9—200页。

战争观中的科学与伦理

一

战争理论中有一种人们熟知的观点，即战争按其性质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但是，谈论战争的性质，这是客观地看待战争，是把它作为认识的对象、科学的对象，而正义和非正义概念只是一种主观立场的表达，因此，这对概念是否适于在科学上为战争定性，有重新研讨之必要。

照西方某些辞书所云，正义战争的概念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早期由公元4世纪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倡导。这大约是指他《上帝之城》一书中的言论^①。然而，人们使用“正义”“非正义”概念谈论战争问题，时间上要早得多。例如，约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载有大量演说词，从中经常可以看到

^① 辞书类著作，如 David Robertson: *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5, P. 170;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卷9“正义战争”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奥古斯丁言论，见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XI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5—136页。

参战各方频频使用“正义”“非正义”的用语为自己辩护或抨击对方^①。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早就对战争有了“义”与“不义”之分^②。

我们今天有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说法，似乎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到根据。例如，列宁曾经说：“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③；革命战争“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④。

经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作了如下概括：

“布尔什维克认为战争有两种：

（一）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性的战争，其目的或者是保卫人民抵御外来的侵犯和奴役人民的企图，或者是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或者是把殖民地和附属国从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其目的是掠夺和奴役别国和别国人民。布尔什维克拥护前一种战争。至于后一种战争，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举行革

① 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9、31、34、35、222、226、229、546页。

② 见《孟子》卷之七，尽心章句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7页。

④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5页。